

你我的大衣櫃

——同志創作之為一種政治運動

游靜

「粉紅的戰士，停下吧！戰衣可重？

枷鎖+理想×政治÷正確……

不知不覺地變歪了。

蜻蜓很失望，一點水面就飛了。

你還能飛嗎？」

——Zita，〈不開心的經歷〉

「在基恩之家認識了幾位同路人，除漢語英文外，還能和她們有第三種語言，她們是超級吸塵機，吸走我心底積久的灰塵。」

——小河，〈同路人〉

連結兩個自我

過去二十年，在紐約及香港，這兩個我曾經或勉強叫做家的地方，朋友大多來自兩個圈子：做藝文工作的，及參與社會運動的。在紐約，游走於這兩個圈子之間的人其實挺多的，但在香港，這兩個社群卻極其遙遠，有點老死不相往來。說得好聽一點，是社運界認為藝文界品味脫俗、高不可攀，藝文界佩服社運界的勇氣，自嘆不如。但說老實話，社運朋友不相信藝文工作者，因為作家藝術家不但傾向對在地社會漠不關心、耽溺於蚊型的個人世界、欠缺政治常識，而且滿口空談、缺乏行動力；藝文工作者瞧不起社會運動，因為行動總是只爭朝夕，而香港文藝充滿劃時空、普世避世厭世想象。

這幾年，漸漸地，我發現當我一只手執着電話筒跟社運朋友討論是否要簽名支援一份聲明時，我的另一隻手很可能在答一個來自電影節或者出版社的電郵。漸漸地，我把自我分隔成一個個抽屜，可關可開，即使偶而一起開着，也會盡量讓他們不需看見彼此，讓我看起來不會太不正常。

二〇〇五年夏天，我跟六位朋友組成「女同學社」，原意是對同年香港基督教團體以「維護家庭」之名、發起鋪天蓋地的反同性戀運動的一次即時回應。當然很快我們發現，由於龐大的社會資源落差，我們的「運動」無論如何敵不過他們的「運動」：你遊行他們更多人遊行、你簽名他們更多人簽名、你投訴他們更多人投訴、你參與政府口頭上諮詢實質是收編的「性小眾論壇」，他們也自認是性小眾要來分一杯羹，讓政府樂透透、架着手看你們鬥爭就不用做了；你如果正面

衝擊建制他們更高興，把握良機總動員來抹黑。從鏗鏘集被勸喻到中大學生報被起訴，不少朋友才猛然驚覺：我們一直引以為傲(既然沒民主只能靠自由)的「言論自由」哪裡去呢？事情其實很簡單：我們極其成功的殖民教育與奴才／官僚管治為了使我們長期安於失權的狀態，儲心積慮地培育出我們彷彿最自然不過的「政治恐懼症候」。我們每個人首先假設所有政治議題皆與我們無關，除非其中牽涉切身利益。換言之，只要你月薪過四千，就無需理會貧窮線；只要你跟家中印傭相安無事，就不需要考慮反種族歧視法修訂；只要你不是基督徒，管它明光社與貞潔運動是啥；只要你家不住灣仔觀塘深水埗，便不需過問城市規劃公民參與；只要你對異性仍然有絲毫興趣，便不用思考同志聲音是否傷害家庭、教壞小孩。這政治恐懼症候群使我們在日常生活各領域中，共謀努力打造一個充份去政治化的環境，把我們對政治的理解抽屜化、狹窄化，好讓一些一直醉心於無限擴張其政治權力的利益集團，把很多人以為與政治關係不大的空間，如家庭、性、文藝、宗教、娛樂，在大家不察覺的時候早就一一攻下，使我們的公共空間買少見少。哪個最被去政治化的場域，便是最容易讓人假借道德、宗教之名單一化的區塊。而這些區塊的版圖，在過去十年，正在不斷擴張。

○六年，女同學社舉辦了一連五節的藝文創作坊。○七年一月，超過一百件寫作及視覺藝術作品在文化中心展出，接下來的一年，巡迴至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及沙田大會堂。一如既往，對這次名為《你們看我們看自己——同志創作展》的展覽，稍有留意的只有同志朋友，及基督徒。在籌劃過程中，我不斷問自己：究竟這樣的一次活動，對香港的同志運動、文化構成及整體政治生態，有甚麼深遠的意義？以這展覽作為案例，如何讓我們可以重新想象並理解，在香港這特定的歷史脈絡下，創作與政治錯綜複雜的關係？

我整理出九點可能性：

- 一、藝文創作鼓勵探索及表達自我，協助把私領域公共化、議題化；
- 二、讓社會看到小眾的資源，促進觀眾(包括自以為是異形戀者)思考自我(性)身份之多面向；
- 三、讓政治弱勢自我認同、體驗充權；
- 四、分眾掌握技巧、把創作非神話化；
- 五、分眾想象及認識社群、把社會運動非神話化；
- 六、藝文創作開關介入社會的不同方法；
- 七、暴露社會的限制及對(同志/性)言論的打壓；
- 八、深化對性議題的討論、製造論述；
- 九、連結分眾社群、認清結構上的弱勢

這九項描繪與強調創作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看似很虛泛，又太理所當然，但若認真觀察與思考目前性弱勢生活在香港的實際情況，其實既不虛泛也不理所當然。

Eve Kosofsky Sedgwick (1990)在《衣櫃的認識論》(*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一書中描繪兩種相異的對同性戀的看法：「少數觀」認為只有少數人是；「普及觀」認為同性戀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行為。這兩種認知的矛盾使同性戀與異性戀之間的界線恆久處於一種需要被斡旋的狀態，成為一種「公開的秘密」。與其說「恐同」是「恐懼同性戀」，不如說是對這兩種認知可以同時存在，並互相滲透影響的恐慌。換句話說，是懼怕有同性戀性行為可能的所有人都變成同性戀者，即「普通人染上少數人的身份，又害怕少數的同性戀者「感染」所有有同性戀性行為傾向的人，讓少數變得普及化。落實到香港的情況，過去集中火力全力攻擊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基督教組織一直掛在嘴邊的，是反對同性戀被「鼓吹」，從高院降低男男肛交合法年齡至港台鏗鏘集《同志·戀人》被「強烈勸喻」等，均可見少數人的平權要求如何被一而再地故意錯讀成「鼓勵所有人跟他／她們一樣」。像《同志·戀人》節目明明只是再現一種少數觀，即社會上原來有些人有如此這般的性身份，這小撮人渴望能有大眾有的一些社會權利。整集完全沒有探討性小眾與主流社會性相的互動關係，如主流社會是否很多人有同性戀性行為、認同、欲望，又或同性戀者的性身份如何影響或感染身邊其它人的性身份及行為等。但批評這集在「合家歡」時段播出的宗教組織及人士卻多次強調該集「教壞小孩」、「影響家庭」，完全改變了節目的論述方向，其實是批評者害怕小眾影響普及，假設大眾很容易受「傳染」，害怕小眾傳染給大眾的道德恐慌表現¹。

認識不一樣的香港

說到底，「恐同症」是害怕自己是，也害怕自己的性伴侶是。由於動機來自對自我探索、自我認識的恐懼，故對其它人對自身同性情欲、性身份的探索同樣懼怕；自己的衣櫃也必須是全世界人的衣櫃，才有泯滅所有被感染、被影響的可能。恐同者在極度恐懼自己「是」的過程中，要求所有人不斷說自己「不是」。所有說自己「是」的聲音都不得不成為代罪羔羊被獵殺。

是在這樣的一個文化脈絡中，鼓勵同志思考自我性身份的多面向、探索及表達自我，一點也不理所當然。社會上龐大的資源及力量都投放在鼓吹同志千萬不得認同自我這相反方向上。所以協助及鼓勵同志創作及公開作品變得如此政治性，又如此舉步維艱。展覽不單在開幕前一週被民政事務局審查，並建議送淫審處裁

¹ 可參考香港性文化學會網上流傳「緊急呼籲」「一人一信支持廣管局對〈同志·戀人〉節目的裁決」：「同性戀以及同性婚姻等議題極具爭議性，同性婚姻無疑要改變現有的婚姻及家庭制度，涉及不同範疇，更會造成巨大的社會改造工程。」；「作為家長我不希望在合家歡時間播放一些只表達同性戀沒有問題的單邊節目，讓我的小孩漠視同性戀的風險。」(cf. <http://moseslam051128.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445271>, 2007年2月9日貼上)

決，並於開幕前兩天被判「不雅」；在舉行導賞活動期間，更有基督徒故意「踩場」，對着身兼導賞員的女同學社核心成員小曹謾罵接近一小時，指他將下地獄云云。如此明刀明槍，分明是人身攻擊，卻毫不受法律保障；被打壓之嚴峻，在今日經常自以為開明自由的香港，相較其它弱勢社群如殘障人士或南亞裔新移民所要面對的，實不遑多讓。

本文開首引兩段工作坊同學詩樣的文字，也必須放在這脈絡下去理解。Zita的「粉紅戰士」滿身枷鎖，在「理想」與「失望」之間，披着過於沉重的戰衣，飛不動了。她的另一件作品〈在尋找生命及生命的意義時，我是否已經墮落了〉中，把「我」拼貼在大海中飄浮，頭髮看來比身體還重，而口中在噴血。不單生命的意義需要尋找，連生命本身也失落了。小河把同志基督徒形容為「同路人」，彼此分享着不同於漢語及英文的「第三種語言」，可見性弱勢身份得以溝通、得以被理解的迫切需要，但又被排除在今日香港的法定語言之外。為甚麼一個人的性身份要變成戰衣、會讓人吐血沉淪，或成為埋藏心底、「積久的灰塵」呢？小河的另一篇寫作是一首七言詩，叫〈神的代言人〉，其中提供了簡潔有力的解釋與回應：「被人指點被人問，是否身心有缺陷？有辱基督的身份。抨擊踐踏同性愛，自封上帝的審裁。」



兩條大路各不相干、方向相反，彼此不可越界……這條橋跨越了兩條大路，人們走在上面，可自由地游走於兩條大路之間，假若人的性別文化也可像此大橋一樣，豈不更好？

Lovely Stephanie, 〈無題〉 (2006)

長期活在被指身心有缺陷、需要埋葬自我、不能被「揭穿」以存活的恐懼中，同志朋友與(自認為是)異性戀者，原來居於一個不一樣的香港。小蟻盯着假日球場上的一把大鐵鎖，想到扣在自己身上的鎖(<同志憂慮的枷鎖>)；站在馬路上指示轉彎的箭嘴旁想到「攀」可能比「直」更快樂(<跟我來>)；Bearity對着茶餐廳的菜牌問，這個要人「扮異性戀的世界」中，是否真的讓人有選擇(<一個要我扮異性戀的世界>、<看似有選擇，其實別無選擇>)；又對着帝女花中女女痴纏的民間傳說身影表達嚮往(<愛>)；小蟻在「分域街」的路牌前質疑為何戀愛要「分」「域」？(<戀愛無界限>)；Joanne挑選了最合適的角度，巧妙地把「當信主耶穌」的廣告牌及「終止」的指示牌放在一塊，一方面凸顯要在性身份及信仰之間二擇其一的荒謬，另一方面在構圖上暗示這種「信主」的方法也應是到達終止的時候了(<信仰·人生抉擇>)。這些每天在我們身邊擦身而過、引以為最尋常的物事與景觀原來在同志的眼中危機四伏、充滿壓迫及各種意涵，處處潛藏着要流露自我、表達反抗的欲望可能。跨性別朋友Lovely Stephanie迫使我們凝視男女廁的門牌上強化的二元暴力(<無題>)，她的另一幅攝影作品要我們向遍佈港九新界的天橋問：為甚麼性別不可以是一個遊走於兩端的過程？(<無題>)。是這些同志創作人，讓我們僥倖有一個超越自身限制的機會，感受我們習以為常、景觀表皮下的香港社會中，一些視而不見的位置；這些作品開拓了我們的視野，讓我們瞥見一個不一樣的香港。

沒有臉沒有頭，皮肉相連的衣櫃

在這個要求我們重新認識的香港中，性小眾是不容許有臉孔的。不論這些同志朋友是在現實的積壓中尋找真實的自我(NA的<id>、<Superego>)，還是嘲弄出櫃的恐懼(Vice的<出不出之嚇>)、表達愛的親密(J&W的<連體>、K&V的<愛>、Bearity的<手牽手>)、述說靈欲想象的奔馳(Febe的<Passion在夢幻中>、Zillywow的<靈慾當「他」遇上「她」>)，還是展演「保衛地球」、抗爭到底的決心(Vice的<女同學社與我>)——這些影像的共通點，都是主人翁之不能露臉。這些「不能露臉」，當然並非偶然。在構思工作坊的過程中，我不斷提醒自己，作為一個自小出櫃又自小創作的人，必須重新思考在「不能露臉」的大前題下，自我表達的多重意義與可能性。這些交回來的功課，充滿着身體部份(手、腳、口、耳)，背着鏡頭、低着頭、別轉臉、戴着面具、包着頭、躲在屏風後、玻璃上倒影過來的，一張張影像。每一張都經過深思熟慮，當事人充分考量了露臉的風險，得來不易；每一張皆在訴說一個不盡相同，又如此相近的，不能露臉的故事。每一張不能露臉的影像，都在提醒觀者，我們要求、期待主體露臉已經是漠視了香港同志的生存現實與困境。這些影像迫使觀者思考，是甚麼樣的觀看暴力，迫這些影像的主體變成沒有臉孔，甚至沒有頭的人？是Jas<無題>中眼睛砌成的十字架與墳墓，還是K<歧>中叫人不安又無從躲避的凝視？K提出反抗的渴望，因為她的白布底裏着的，是龐大的，權力的不平等。思考創作的政治性，

讓我們重新認識香港社會的限制及其既定權力關係，並讓我們想象有改變，及共同參與改變的可能。政治與文學藝術的有機互動促進藝文領土的民主化，又拆解既有政治場域的疆界，改變兩者的遊戲規則與定見。



小蟻，〈脫下華麗的面具，表現自我〉（2006）

小蟻的〈脫下華麗的面具，表現自我〉不但以逆轉的凝視(reversing the gaze)提醒你，華麗耀目的香港外表下，遮掩著的勞累與憤怒，更以貼着臉孔、叫人觸目驚心的剪刀與黑白照中血紅的咀唇，凸現衣櫃的雙重暴力——不單是衣櫃加諸在自我身上的重擔，需要「脫下」，更厲害的是衣櫃可能已成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剪掉面具猶如剪掉自我的一層皮一樣冷、傷且痛。這張照片中斜線(臉與頭的輪廓、剪刀)與切割(被切割的眼睛、咀唇)，配合切割中的動作(剪面具)與欲望(「表現自我」)，形成構圖上互相平衡又拉扯的張力，在在提醒我們這些假設自己在衣櫃外的觀眾，「衣櫃」如何是一個不斷被傳染、不斷被強化的過程，並深深植於我們每人的肌膚血脈之中，並不是靠一兩次或一兩個人的出櫃便能打造理想新世界。對於絕大部份同志來說，每一次的出櫃，都換來一次被隔絕(小蟻：「當她知道我是同志後，便開始遠離我了」；Bearity：「換來一句句狠批」；K：「太易動情，太多傷害。就像求職見工，不易被聘」；Febe：「自小意識到，我不能讓人看穿我喜歡了令我心動的女孩子！」)，而這些隔絕，不單是來自社會、家人、愛人、朋友，也同時來自每個人的自我。在出櫃的旅途上，自我也得與自身的恐同面對面，也是一個割捨自我組成部份的過程：「這種心痛直到現在依然時不時發作，像是一場大手術過後，需要覆診服藥的警告。」(Marco的〈作為一個女同志最痛苦的事——走在自然〉)。

從差異到平常

同志創作展讓一些平常沒有資源與機會面向公眾的同志朋友創造各自獨特的、介入社會的方法，也藉此加深認識同志及性弱勢社群的多元面貌。文化藝術在香港的社會運動脈絡中一向被假設為無關宏旨、「軟性」、非政治化活動（也是長期官方／殖民論述的一部份），但正是透過孕育、整理與展現這些集腋成裘的創作成果，才能稍為顯現香港同志運動中不常見的差異色彩：Joanne < Pure Lesbian > 拼貼中，男頭女身並叫自己做「Pure」的跨性別／性向認同、栢琛「非男非女、亦男亦女的我」遇上「非男非女、亦男亦女的妳」的安卓珍妮連體戀、Zillywow「她」與「他」，又稱B與G的role-play啜核私語，還有ele把「靈魂的受傷者」脖子勒起來的S/M玩意等等。這些斑斕的影像，向所有同志必須面對的，時刻活在被同質化的大衣櫃中的現實(作為一樣的「同志」)挑戰。



Marco, < 這個Tomboy盡量Man! > (2006)

差異不但展演在性別、性向認同、性愛方式上，也顯現在資源的不均如階級、身形上。Marco的< 這個Tomboy盡量Man! >中身後的碌架床、板間房，配上他自我形容為「四呎七吋的身形」，與照片前景中他豎起的姆指、兩邊的槍、格子襯衫與牛仔褲經營的陽剛氣(「Man」)之間形成龐大的反差，充份凸顯出這張照片中難得的、肯定與展演自我的特殊意義：一個慣常被看扁了的自我，要展演出差異的巨大意志，遠遠超出物質與身體的限制，叫人動容。

這次創作展當然也可看成是一次集體的出櫃。只有出櫃後才得以與恐同勢力面對面。這也是一次讓所有創作人與組織者進一步集體認識香港社會對性弱勢話語、言論權打壓的機會。工作坊的同學們集體寫了一封「給小小同志的信」，展覽卻被判為「不適合十八歲以下人士觀看」，實為最大的諷刺。如果不同的政治弱勢社群能夠透過創作，從深埋在社會暗處的各種衣櫃角落中，冒出頭來，瞥見彼此的傷痛、不安、控訴、歡愉、異質，並共同開拓與發展更多屬於我們的，分眾話語，感染躲在大眾心中的每一個小眾個體。只有小眾能夠相認，小眾的確才有普及化、平常化，變成大眾，又或瓦解大眾，變成大家都不再需要有大眾，不再需

要有「公開的秘密」的一天。藝文創作的政治力量，莫過於此。

(《你們看我們看自己——同志酷愛創作》一書將於今年底由進一步出版。)

游靜

「女同學社」創會同學之一。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散文集《另起爐灶》、《裙拉褲甩》、電影評論集《性 / 別光影：香港電影中的性與性別文化研究》、詩集《不可能的家》，編有《性政治》等書。電影作品包括《好郁》、《另起爐灶之耳仔痛》、《我餓》等。